

大宅

Great House

NICOLE KRAUSS

(美) 妮可·克劳斯 著 翁海贞 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大宅

Great House
NICOLE KRAUSS

(美) 妮可·克劳斯 著 翁海贞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宅 / (美) 克劳斯著 ; 翁海贞译 . —南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 2015.6

ISBN 978-7-5500-1409-1

I . ①大… II . ①克… ②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 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23338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 14-2015-122

Copyright © 2010 by Nicole Kraus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elanie Jackson Agency, LLC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： 330038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E-mail bhz@bhzwy.com

书名 大宅
作者 [美] 妮可 · 克劳斯
译者 翁海贞
出版人 姚雪雪
出品人 黄育海
责任编辑 王丰林
特约编辑 杜晗 任战
封面设计 汪佳诗
责任印刷 姜天意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1/32 890mm × 1240mm
印 张 9.375
字 数 188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5.90 元
ISBN 978-7-5500-1409-1

赣版权登字： 05-2015-247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I

- 003 全体肃立
- 046 真 善
- 074 游泳窟
- 108 孩子的谎言

II

- 171 真 善
- 201 全体肃立
- 242 游泳窟
- 286 怀 茨

I

全体肃立

跟他说话

法官大人，1972年冬天，R和我分手。也许该说他要和我分手。他的理由含糊，大略是说，他另有个见不得人的自我。他从来没有向我展示过这个懦弱、叫人鄙薄的自我。他需要时间休养生息，像一头病兽，独自蛰伏，调养这个自我，直待养得他认为担得起跟人作伴。我跟他辩驳，我们相处近两年，他见不得人的隐私，自然也是我的，倘若他的天性里有狞恶或孱弱，纵使瞒过千万人，我也该知晓的。争辩没有用。他搬走了，三周后给我寄来明信片（没有寄信人地址），卡片上写道，他认为，我们作出这个决定（这是他的原话），尽管十分艰难，却也万分有益。我只得说服自己，我们的关系就这么收场。

我的生活好转之前，一度糟糕极了。我不愿细述过往，只想

说我闭门不出，不去看祖母，更不许友人来看我。荒谬的是，伴我度过那段难挨日子的，竟是连日的风雨。雨霾风障时，我得拿着专拧老窗闩的模样古怪的小铜扳钳，在公寓里四下急奔。风一紧，窗闩就松开，窗户便嘶叫起来。公寓里有六扇窗，才上紧一扇，另一扇就号啕开来，我只得手持扳钳奔去。然后也许能得半小时的宁静，我就坐在公寓里仅剩的一把椅子上。至少在那一段日子里，世间好像只剩下不休的霪雨，不停地拧窗闩。天气终于转晴，我出门散步。一切淹过水，平静耀眼的水面透着一股空寂。我走了很久，有六七个钟头，走过以往从不曾到过，以后也没再去的周边街区。回到家来，我疲乏极了，心头却仿佛得到净化。

她洗去我手上的血迹，给我一件干净的T恤衫，也许是她自己的。她可能以为我是你的女友，甚或妻子。你的亲人还没有来。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。跟他说话。

没过多久，R搬走他的大钢琴，从客厅的大窗往下吊，一如当初从这扇窗户吊上来。这是他留在这里的最后一件东西。只要钢琴还在，我就觉得他似乎不是真的离去。钢琴搬走前，我和它已经独处几个星期，走过它旁边，时而拍拍它，一如以前我那样拍拍R。

过了几日，老友保罗·阿尔珀斯打来电话，跟我说他的梦。在梦里，他说，他和伟大诗人塞萨尔·巴列霍一起，在他故国的

房子里。巴列霍自幼住在这幢房子里。屋里并无他物，四壁刷着蛋壳青的白色。整个场景好祥和，保罗说，在梦里，他思忖着巴列霍真够幸运的，能在这样的地方写诗。保罗跟他说，这地方蛮像去冥界之前的暂居地。巴列霍没有听见，他只得又说了两遍。诗人听见了，点点头。在人世间，四十六岁的巴列霍身无分文，在暴风雨里殒命，正如他预言的死亡。两人进屋前，巴列霍给保罗讲故事。他的叔父总是用手指沾烂泥，抹在额头上——圣灰星期三的仪式。巴列霍接着说（保罗说），他会做些我从来不能理解的事。为了叫保罗明白，巴列霍伸出两指，沾些烂泥，在保罗的上唇画下一道髭须。两人相对而笑。在梦里，保罗说，最叫人惊讶的是两人的默契，仿佛交情很深。

梦醒后，保罗自然想起我。我们在大二先锋派诗人研讨班认识。我们在课堂里结下友谊，因为我们总是彼此认同，而其他人总是反对我们，随着课程进展，他们对我们的异议愈加强烈，保罗和我成了盟友。时间过去——五年了，即便是现在，我们的盟友情谊依然不减当年，能够随时随地互通心曲。他问我过得怎样，暗指我和 R 分手，定是有人告诉了他。我说还好，只是觉得不断地掉头发。我还告诉他，跟 R 一道离开的不只是钢琴，还有沙发、椅子、床、餐具。我遇见他时，所有家当仅够装满一只提箱。他则宛如趺跏佛陀，周身环绕着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家具。保罗说他可能知道一个人，诗人，朋友的朋友，要回智利去，可能要找人家寄存家具。他打了电话，得了准信。这位诗人叫丹尼尔·瓦尔斯基，确实有几件不知如何处置的家具，因为不

想卖掉，以备哪天改变主意，再回纽约。保罗给我丹尼尔的电话号码，说他等着我联系他。我拖延了好几日，尽管友人打好了招呼，但跟陌生人开口要家具，仍然叫我难堪；何况这个月 R 搬走所有东西后，我习惯了空无一物。只在有人来访时，我才正视这个问题。从访客的神情可以看出，我公寓的境况，我个人的境况，法官大人，肯定显得万分凄惨。

我终于拨通丹尼尔·瓦尔斯基的号码。电话只响一声，他就接起。起初，他不知电话另一头是何人，语气甚为警惕。后来，我把这个特征跟丹尼尔·瓦尔斯基，跟智利人联系起来，尽管我遇见的只有寥寥数人。他用了一分钟识别我的身份，弄清我并不是哪个不靠谱的女人，而是朋友的朋友。关于他的家具，她听说他想处理掉，还是租借出去？这一分钟里，我犹豫着要不要跟他道歉，挂上电话，继续过一张床垫、几只塑料盘子加一把椅子的生活。不过，疑惑过后，灵光一闪。（啊哈！当然啦！抱歉抱歉！一直在这里等着你呢。）他的语气柔和下来，嗓门也响亮起来，表现出豁达的气概。我也将这豁达跟丹尼尔，跟站在抵着南极心脏的匕首尖呐喊的人们联系起来。亨利·基辛格这么形容他们。

他住在市中心，第 99 街和中央公园西道拐角。往他家去的路上，我顺便去看住在西端大道养老院的祖母。她早就不认得我了，不过习惯后，我发觉自己倒更能享受这样与她相处。通常我们就坐着，以八九种方式谈论天气，然后话题转到祖父。他去世已有十年，却依然是她痴想的对象，似乎他的人生，抑或他们共度的人生，随着年光辗转，在她心里越发隐含奥义。她喜欢坐在

沙发上，戴着所有首饰，赏视这间客厅——这些都是我的？她不时相询，双手比画着，把整间客厅括进臂弯。每一回去看她，我在萨巴美食店买一盒巧克力海绵蛋糕。出于礼貌，她吃上小口，蛋糕屑落在腿上，沾在唇上。我离开后，她就把剩下的蛋糕分给护士吃。

我来到第 99 街，在楼底按了铃，丹尼尔解开锁，让我进入公寓楼。站在脏暗的大厅里等电梯时，我突然想到要是不喜欢他的家具，要是它们看起来沉重或压抑，那可如何是好。届时就是想拒绝，也很难说出口了。然而事实恰好相反，他打开房门，我的第一印象是光亮，如此光亮，逼迫得我眯起双眼，一瞬间里，我看不清他的面庞，只见朦胧的轮廓。空气里弥漫着菜肴的味道，后来得知是茄子，他在以色列学来的煮法。待眼睛适应了光亮，我才看清丹尼尔的相貌，竟这么年轻，我大为诧异。原以为他年纪挺大的，因为保罗说他的朋友是诗人，尽管我们两人也写诗，或者说试图写诗，却从来不敢妄称自己为诗人。在我们看来，这个称号应该冠给那些写的诗被认为值得出版的人。不单是刊载在一两本名不见经传的杂志上，而是真正的书，书店里买得到的书。回想往事，这个对于诗人的定义，俗套得叫人难堪，但我和保罗，还有其他一些人，仍旧骄矜于自己老练的文学见地。那些年里，我们拎着齐全的理想漂荡，在某种程度上，理想也令我们盲目。

丹尼尔二十三岁，小我一岁。他虽不曾出版诗集，但他的人生似乎过得更好，或者说更富有想象力，可以这样说，他感受着

一种冲动，要去不同的地方，见不同的人，经历不同的事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在他人身上见到这份冲动，我的心底总会生起妒意。过去四年里，他四处旅行，在不同的城市生活，在途中偶遇的人们的公寓地板上过夜，有时说服了母亲或许是祖母汇钱来，就在自己的公寓地板上过夜。不过，眼下他要回家去，跟幼年的伙伴并肩作战。这些伙伴正在为智利的解放、革命，或者至少是为智利的社会主义而抗争。

茄子焖好了。丹尼尔布置餐桌，叫我四下看看家具。公寓不大，南面倒有一扇大窗，阳光照进来。最叫人吃惊的是屋里着实杂乱，地板上散满纸片、污着咖啡的泡沫塑料杯、笔记本、塑料袋、廉价胶鞋、散了架的唱片和唱片套。换作别人，肯定会不住地说，不好意思，屋里乱。或者开个玩笑说，刚有群野兽闯过屋子。丹尼尔却不置一词。略显空白的只有墙壁，只钉着几幅地图，他生活过的城市：耶路撒冷、柏林、伦敦、巴塞罗那。一些街道、拐角和广场密密地写满笔记，我看不太懂，写的是西班牙语，况且主人兼施主正在布置餐具，我要是凑近细细研读的话，实在显得鲁莽吧。于是我转念看家具，或者说淹没在杂物下的家具：一张沙发，一张异常庞大的木书桌，装着大大小小很多抽屉，两个书架，摆满西班牙语、法语、英语书籍，最漂亮要数铆着铁扒钉的柜子，或者是方顶箱，好似从海底沉船打捞上来的，当作咖啡桌使唤。这些家具想来悉为旧物，无一件簇新，但都分享着一种同情。事实上，乱纸与书堆的压迫，反令它们更加动人。我的心头猝然涌起对它们主人的感恩，好似他给我的不单是

木头和布做的家具，而是开始崭新人生的机会，眼下就看我如何担当起来。我要难为情地承认，泪水涌上我的眼眶，法官大人，正如通常的行为习惯，我为着从前那些模糊的懊悔，一直压抑着情绪，不肯哭泣，而眼前陌生人或赠或借的家具，却将眼泪全都招惹出来。

我们说话，至少说了七八个小时，也许更久。我们发现彼此都钟爱里尔克，也喜爱奥登，只是我更喜爱，对叶芝皆无好感，不过私底都为此不安，因为这也许意味着我们对于诗歌的本真层面的领悟，有着性格上的缺陷。话不投机的时刻只出现一次，是我说起聂鲁达，我仅知的智利诗人，这惹恼了丹尼尔。怎么回事，他责问，不论智利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，聂鲁达和他操他娘的贝壳早在那里搞了垄断？他直盯着我的双眼，等着我反驳。他那样看着我，我猛然领悟在他的祖国，这样的谈话场景是极寻常的，谈诗歌谈得激怒，一息间，我的心头掠过孤寂。只是转瞬间罢了。我忙不迭地道歉，指天画地发誓去读他信手写在纸袋背面的智利伟大诗人。精炼的名单，排在第一位的是尼卡诺·帕拉，大写字母拼写，令随后的姓名顿然失色。我还发誓无论在他或别人面前，绝不再从我口中说出聂鲁达这个名字。

接着，我们谈起波兰诗歌，俄罗斯诗歌，土耳其、希腊和阿根廷的诗歌，谈起萨福和帕斯捷尔纳克散佚的笔记，谈起翁加雷蒂的死，威尔登·基斯的自尽，亚瑟·克拉文的隐迹，丹尼尔说他还活着，由墨西哥城的妓女照拂着。然而，汗漫无际的话语间，阴霾时而笼上他的面庞，略作踟蹰，似欲逗留，尔后隐灭，

消失进墙根。这样的时刻，我觉得该别过头去，装作没有看见。因为我们谈论诗歌，虽谈了很久，却还没谈起自己。

某个时刻，丹尼尔跃起，奔到装着无数抽屉的书桌前，拉出几节抽屉，又关上，翻寻一组诗。诗题是《忘记所有我说过的话》，或者类似的题目，他自己翻译成英语。他清清嗓子，放声朗诵。他的声音微带颤音，要是换作别人，这声音会叫人觉得造作，甚至滑稽，然而出自丹尼尔，却叫人觉得再自然不过。他也没有先谦逊一番，或是把头埋在诗稿后。完全相反，他挺直站着，像一根柱子，仿佛从诗里借得力量。他不时从诗稿里抬头，那么频频抬头，我揣度他对自己的诗烂熟于胸。在某个这样的时刻，在词语间对眼相看的时刻，我发觉他其实长得挺好看的。大鼻子，智利犹太人的大鼻子，大手掌，手指纤瘦，大脚板，但他身上有一种东西，叫人觉得他很优美，也许是长睫毛，或者是骨骼。诗是好的，不伟大，但是很好，可能比很好更好，自己没有读一番是很难说的。好像是写令他伤心的女子，不过也很可能是一条狗。因为听到一半，我就走神了，脑子里回想 R 如何总是睡前洗他瘦长的脚板，因为公寓的地板脏，可他从不要求我也洗，毫无疑问，我要是不洗，床单还是会弄脏，那他洗脚也没有用。我不喜欢坐在浴缸沿，或者站在盥洗池前，膝盖贴着耳朵，看着污垢在白瓷盆里打转。然而我们一生里，就是做着无数这样的细事，只为了避免争执。眼下想起这件事，叫我又想笑，又想暗暗唏嘘。

此刻，丹尼尔·瓦尔斯基的公寓暗了下来，悠悠如同深水

底，太阳落在高楼后，潜在万物背后的阴影纷沓现身。我记得他的书架上摆着厚重的书籍，好精致，裹着布书脊。我一个书名也不记得，也许是一套丛书，只是它们似乎跟渐暗的时光沆瀣一气。公寓的四壁仿佛眨眼间蒙了毡布，跟电影院似的，将声音密匝地圈在屋里，或者不让别的声音进来。然而置身于那个空间，法官大人，在那样的光线下，我们两人既是观众，又是画面。抑或唯独我们两人脱离了岛屿，如今漂浮在无名的海域，漂浮在深不可测的黑水上。那时候，人们看我还是有些姿色的女人，甚至有人说我美丽，尽管我的皮肤一向不好。照镜子时，我只看见糟糕的皮肤，不安的神情，无意识地蹙起眉头。不过，和 R 在一起前，以及和他在一起时，不无男子坦言要跟我回家，一夜或者更长时间。丹尼尔和我站起身，走向客厅时，我好奇他是怎样看我的。

正是在那个时刻，他告诉我，洛尔迦一度在这张书桌上写过诗。我摸不准这是玩笑还是真事。这个智利旅人，年幼于我，竟得到这样珍贵的东西，好像不可思议。不过我决定当真，不致冒犯对我只有善意的人。我询问他如何得到的书桌，他耸耸肩，说道，买的。却不细说。我原以为他会说，现在我把它给你，可他没有说，只是踢一下桌腿，不是粗暴地，而是轻轻一脚，满是敬意，然后挪开步子。

那时或是之后，我们拥吻。

她又往您的输液袋注入一支吗啡，把一根松开的电极在您的胸前搭好。窗外，耶路撒冷晨光熹微。一时间，她和我看着心电

图仪上起伏的绿线。然后，她拉上窗帘离去，留下我们两人。

吻得叫人扫兴。不是吻得不好，这只是我们漫长谈话的标点符号，小括号里的注释，用来确定相互间深切的认同，意气相投的情谊，这些比性爱激情甚或爱情更稀罕。丹尼尔的双唇比我预想的阔大，在他的脸上不显大，但当我闭上双眼，他的嘴唇印上我的嘴唇，一息间，我觉得他的双唇要将我窒息。也许只是因为我习惯了 R 的嘴唇，非闪族人的单薄，寒冷天里会冻得发青。丹尼尔·瓦尔斯基一只手摩挲我的大腿，我抚摸他的头发，闻着像一条肮脏的河流。我想，那时我们正在谈论或者正要谈论政治的肮脏，丹尼尔·瓦尔斯基先是愤怒，尔后索然泪下，攻击尼克松和基辛格他们的国际制裁、残忍的阴谋。这些手段，他说，是要遏制智利新鲜、年轻、美好的一切，扼杀希望。正是这个希望，将阿兰德医生一路送进拉莫内达宫。工人的工资涨了 50%，他说，可这些猪猡，眼里只有他们的铜矿、跨国企业！民主选举的马克思主义总统，光是这个念头，就够叫这批人屁滚尿流！为什么不能让我们清静地过自己的日子，他说道，那一分钟里，他的神情近乎乞求，甚至哀告，似乎我们的国家航船上心怀安忍的掌舵人，竟受着我的掌控。他的喉结硕大，一咽口水，喉结就跃起。这时候，他的喉结不停地跳跃，如同海上翻腾的苹果。我不大懂智利的事，至少那时我还不懂。一年半后，保罗·阿尔珀斯告诉我，曼努尔·康特雷拉的秘密警察在深夜带走丹尼尔·瓦尔斯基的时候，我是懂的。然而 1972 年春天的黄昏，我坐在他第

99 街的公寓里，奥古斯托·皮诺切特·乌加尔特将军尚在扮演谦卑内敛的军队参谋长，和蔼地哄友人的孩子管他叫爹爹，那个时候，我是不太懂的。

叫人奇怪的是，我竟不记得那一夜是怎样结束的。当时纽约城沉入浩漫的黑夜。道别后，我离开他的公寓，这是显然的，或者我们一道离开公寓，他陪我走到地下铁，或是为我拦下出租车，因为在那时，附近的街区，甚至整座城市，都不甚安全。可我丝毫不能记起。大约两周后，我的公寓楼前驶来一辆搬家卡车，工人卸下家具。那时候，丹尼尔·瓦尔斯基已回故乡。

辗转两年。起初，我收到明信片。一开始，卡片上写着温煦甚至欢欣的句子：一切都好。我打算加入智利洞穴研究协会，莫担心，不会耽误我写诗，这两项事业只会协济相得。我可能有机会去听帕拉的数学课。政治形势很糟糕，要是不加入洞穴研究协会的话，我可能要加入 MIR^①。好好照料洛尔迦的书桌，哪天我要回去拿的。啵一个，D.V.^②。政变后，明信片的语气一转沉重，接着晦涩起来，再往后，明信片不再来，直到六个月后，我听说他消失了。我把明信片收在他的书桌抽屉里。我没有回过信，因为没有回信地址。当年，我还在写诗。我写了几首的诗，或是关于或是献给丹尼尔·瓦尔斯基。我的祖母过世，葬在无人方便顺访的偏远郊区。我跟一些男子约会，搬过两次家，在丹尼尔·瓦尔斯基的书桌上写出第一部小说。有时，一连数月不会想起他。我

① Movimiento de Izquierda Revolucionaria，智利左派革命运动。

② Daniel Varsky.